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第2卷第7号 2018年7月

<http://jeast.ioc.u-tokyo.ac.jp/>

台湾省议会与反对派的形成：
党外议员的行动与战略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印

目次

■ 摘要.....	I
■ 论文	
前言.....	1
台湾省议会：“台湾大”的民意代表机关.....	3
“五龙一凤”时代的省议会.....	5
党外与党外政治：从政党体系的观点所做的分析.....	11
结论：“五龙一凤”留下了什么“遗产”？.....	14
■ 附记.....	i
■ 作者简历.....	ii

摘要

本文的目的，是透过党外的台湾省议会议员的行动与战略，来分析国民党一党独大时期的台湾反对运动，也就是代议政治的反对势力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基本假说，就是如果从所谓“台湾大”的民意来进行分析，台湾的反对势力的发展起源可以回溯到台湾省议会，而且1970年代以后国会也朝台湾大的趋势逐渐发展，当时党外国会议员就是继承了省议会的前辈们所累积、建构的思想与行动模式，本文希望能够尝试对这个假说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透过地方政治研究有关省议会的研究成果，与近年来在编纂方面相当有进展的省议会关连史料为基础，以被称为五龙一凤（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的第一代党外省议员为分析对象，探讨（一）他们的言论的构造，（二）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下基于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采取行动的模式，（三）党外的领导人之间、领导人与支持者之间的人际网络是如何建构、其运用的方式为何，（四）党外议员在战略上如何利用或维持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等既有政党之间的关系。然后以这些探讨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第一世代与下一个世代的党外议员之间的思想与战略上的延续性。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under the Koumintang's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 focusing on behavior and strategy of *Dangwai* assemblymen in Taiwan's Provincial Assembly. The basic hypothesis is tha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iwan-sized" people's will, the rise of the parliamentary opposition dates back to Provincial Assembly and their thought and behavior were inherited to politicians who led democratic movement of 1970s. After reviewing extant literature and recently compiled historical resources, the behavior and strategy adopted by the first generation *Dangwai* assemblymen (Li Wanju, Guo Guoji, Guo Yuxin, Wu Sanlian, Li Yuanzhan and Xu Shixian) called "Five Dragons, One Fenix" are analyzed, in terms of (1)structure of discourse, (2)idea and value behind their behavior vis-a-vis governmental control, (3)personal networks developed between them and with their supporters, and (4)strategic use of existent parties (Youth Party,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Also, the continuity in behavior and thought between these first generation assemblymen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Dangwai* politicians is discussed.

台湾省议会与反对派的形成： 党外议员的行动与战略

岸川毅

(上智大学全球学部教授)

黄伟修 译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一、前言

本文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党外的台湾省议会议员的行动与战略，来分析国民党一党独大时期的台湾反对运动，也就是代议政治的反对势力如何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本文提出的基本假说，就是如果从所谓“台湾大”的民意来进行分析，台湾的反对势力的发展起源可以回溯到台湾省议会，而且 1970 年代以后国会也朝台湾大的趋势逐渐发展，当时党外国会议员就是继承了省议会的前辈们所累积、建构的思想与行动模式，本文希望能够尝试对这个假说进行初步的分析。首先，透过地方政治研究有关省议会的研究成果，与近年来在编纂方面相当有进展的省议会关连史料为基础，以被称为五龙一凤（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吴三连、李源栈、许世贤）的第一代党外省议员为分析对象，探讨下列几个问题：第一，他们的言论的构造；第二，他们在国民党政府的制约下基于什么样的思想、价值观采取行动的模式；第三，党外的领导人之间、领导人与支持者之间的人际网络是如何建构？其运用的方式为何；第四，党外议员在战略上如何利用或维持与青年党和民社党等既有政党之间的关系。然后以这些探讨为基础，进一步分析第一世代与下一个世代的党外议员之间的思想与战略上的延续性。

从省参议会（1946～51）、临时省议会（51～59）、到省议会时期（59～98）的台湾省议会相关研究，是自 1980 年代末期开始累积至今。其中议会史的研究以郑牧心的《台湾议会政治 40 年》（1987）、李筱峰的《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增订版）》（1993）、郑梓的《战后台湾议会运动史之研究：本土精英与议会政治（1946～1951）》（1993）为代表；从议员个人的特性来探讨省议会的内涵与变迁的研究，以陈明通的《威权政体下台湾地方政治菁英的流动（1945-1996）：省参议员及省议员流动的分析》（1990）与〈日据背景与大陆经验：论影响省议会菁英形成与变迁的

录与传记出版，不过上述的两类史料是基于共同的基准，有系统的针对将近 50 名前省议员的数据进行整理与访谈所编撰的，由于访谈对象不限于重要政治人物，因此口述记录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前议员，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把握议会的整体面貌。虽然这些史料并不包括许多已经过世的前议员的访谈，但可以帮助我们从其同事，也就是同时代的其他前议员的谈话与评价对这些过世的前议员进行解读。所以本文除了相关的先行研究外，也将特别以上述两种史料体系为重心，进行分析。

二、 台湾省议会：“台湾大”的民意代表机关

观察台湾的政治史时，如果要区分中央与地方，都会在名义或实务上出现不一致之处而不易进行讨论。笔者想以若林正文提出的“台湾大”²这个语汇，以统一整个讨论的概念与用语。从所谓“台湾大”的民意机关的角度进行分析时，台湾的议会是源自于日本殖民时期，台湾人在追求自治的过程中促成了议会的成立，台湾光复后又在统一中国的地方自治的逻辑下再造，最后发展成为了不以追求统一中

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高育仁口述，《高育仁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许新枝口述，《许新枝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李炳盛口述，《李炳盛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张文献口述，《张文献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黄镇岳口述，《黄镇岳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林明德口述，《林明德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刘炳伟口述，《刘炳伟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吴复生口述，《吴复生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陈新发口述，《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魏纶洲口述，《魏纶洲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1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邱连辉口述，《邱连辉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年）；台湾省咨议会编、何春木口述，《何春木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年）；台湾省咨议会编、许信良口述，《许信良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吴水云口述，《吴水云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吴伯雄口述，《吴伯雄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5年）；台湾省咨议会编、林俊廷口述，《林俊廷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5年）；台湾省咨议会编、苏俊雄口述，《苏俊雄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5年）；台湾省咨议会编、华加志口述，《华加志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6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陈庆春口述，《陈庆春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6年）；台湾省咨议会编、蔡赞雄口述，《蔡赞雄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6年）；台湾省咨议会编、游锡堃口述，《游锡堃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6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黄金凤口述，《黄金凤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7年）；台湾省咨议会编、陈锡章口述，《陈锡章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8年）；台湾省咨议会编、简维章口述，《简维章先生访谈录》（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10年）。

² 若林正文，《台湾—分裂国家と民主化》（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若林正文，《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增补版）》（研文出版，2001年）。

国为前提的民意机关。

推动所谓“台湾大”的政治运动是从日本殖民时期开始，受到战间期民族主义世界性的高涨、大正民主运动的影响，蒋渭水、林献堂、林呈禄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中心，在日的台湾人菁英开始推动寻求自治与建立代议制的运动。他们一开始寻求设置台湾议会，但逐渐将重心放在改善地方自治，他们从 1921 年到 34 年之间就推动了 15 次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³，当中的成员包括了光复后担任省参会议员的林献堂、临时省议会与省会议员的吴三连、高雄县长的杨金虎等人。另一方面，台湾文化协会（1921 年成立，27 年分裂后成为台湾民众党）则以建立台湾文化与台湾人意识为目标，开始在台湾各地推动大众启蒙运动。虽然最后只实现了提高部分的自治程度（1935 年）与限定程度的中央参政（1934 年），但台湾人菁英们为了寻求台湾的自治所进行的活动，以及参与了受到限定的地方议会运作所获得的经验，可以视为是之后的议会政治的准备阶段。

台湾第一次实施普选，也是第一次正式的“台湾大”选举是地方选举的层次，国民党在台湾因为日本战败而回归成为中华民国的一省后实施了选举。首先是 1946 年实施的省级民意机关的省参议会选举，虽然是透过县市参议员的间接选举，但是应选 30 人却有 1180 人参选，可以象征台湾社会在光复后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⁴。之后在 1951 年设置了同样是透过间接选举选出的第一届临时省议会，54 年的第二届临时省议会则改为直接选举，成为了直接代表台湾选民的民意机关，57 年的第三届临时省议会在任期中升格成为正式的省议会。

但这个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却在民主议会的功能上存在着几个根本性的制约。第一个制约是台湾仅是中华民国的“地方”，最后的决定权掌握在实际的领域几乎等于整个台湾的中央政府手中，而且这个中央政府是由国民党所掌控；第二个制约是省主席的任命方式，省主席掌握了台湾省这个地方政府的最高决定权，但其产生方式却是中央任命制，民意无法对其进行任何监督。第三个制约是来自于“党禁”，由于国民党政府实施“党禁”，禁止新政党成立，因此台湾省议会只有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三个政党，不属于这三个政党的候选人只能以无党籍的身分参选，因此政党竞争这个议会政治的重要关键因素受到了非常大的限制。也就是说，透过台湾省议会能够实现的目标，最多只有“基于民意选举议员，议员透过审议反映民意”的部分，之后只能期待省政府能将议会的讨论做为政策来实施。实际上在国民党的强大的统制力下，省议会能够发挥的地方非常有限。

不过虽然有这样的制约，省议会仍然是代表台湾民意的最高机关，代表台湾基层社会的省议员们也为此努力。在大陆选出的国会（国民大会、立法院、监察院）因为属于非常事态的内战而持续没有进行改选，成为了所谓的“万年国会”，反而省议会虽然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但因为定期改选而可以代表民意，成为了唯一可

³ 若林正文，前揭《台湾抗日运动史研究（增补版）》。

⁴ 李筱峰，《台湾战后初期的民意代表》（台北：自立晚报社，1993），页 21-24。

以实践“台湾大”议会政治的议场。许多前省议员一致认为，相较于不改选且非常没有活力的立法院，透过选举产生的省议会非常有活力、有存在感，可以说是政治的中心⁵。甚至在国会的增补选刚开始的时期，有许多人仍然优先将参选省议员视为目标⁶。

对省议员来说，与省政府（其背后就是中央政府）对立时的无力感，以及背负着民意的自负与活力可能都是一种现实，本文特别以后者为关注的焦点。省议会是地方选举的最顶端，即使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干涉，只要选举持续实施，就可以得到所谓身为人民代言人的自负感，而不断与国民党政府唱反调、不断批判国民党政府的党外议员则使省议会成为更符合议会政治的议场。地方选举在 1950 年代刚开始在台湾各地实施时，许多承受压力但仍坚持贯彻自己信念，拒绝加入国民党的人士成为了党外议员，在台湾社会的基层不断培养实力而成长。

三、“五龙一凤”时代的省议会

在这样的政界环境下展露头角的，就是几位被称为“五虎将”、“五龙一凤”的省议员。所谓的“五龙一凤”指的是向国民党政府挑战，提出各种质疑的李万居（参、临 1、临 2、临 3/第 1、2、3）、郭国基（参、临 3/第 1、2、4）、郭雨新（参、临 1、临 2、临 3/第 1、2、3、4）、吴三连（临 2、临 3/第 1）、李源栈（临 3/第 1、2、3）、许世贤（临 2、临 3/第 1、2、3）等六位党外议员。如表所示，这六个人全部都担任省议员的时期只有第三届临时省议会（任期中正式升格为第一届省议会），他们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被称为五龙一凤，之后虽然并非六个人会同时当选，但 50 年代中期到 60 年代中期，至少会有四个人担任省议员。

李万居（1901~66）在这六人当中算是重镇，他是半山，当年以青年党员的身分协助国民党政权接收台湾，在省参议会担任过副议长，之后连任了六届的议员。郭国基（1900~70）曾以国民党员的身分协助接收台湾并当选省参会议员，但在二二八事件时被逮捕下狱，之后离开国民党，以无党籍身分成功重返临时省议会，他因为其激烈的性格与言论而知名，被称为“郭大炮”。吴三连（1899~1988）曾以无党籍国民大会代表、官派台北市长的身分参与了国民党的台湾统治，并当选了第一届的民选台北市市长，之后又担任了两届的省议员，他同时也是在台南拥有势力的企业家。与李万居同为青年党员的郭雨新（1908~85）是参加补选而进入省参

⁵ 台湾省咨议会编、陈庆春口述，前揭书，页 39；台湾省咨议会编、林明德口述，前揭书，页 54；台湾省咨议会编、黄金凤口述，前揭书，页 61；台湾省咨议会编、林佺廷口述，前揭书，页 26、33；台湾省咨议会编、余陈月瑛口述，前揭书，页 26-27；台湾省咨议会编、许信良口述，前揭书，页 30。

⁶ 台湾省咨议会编、游锡堃口述，前揭书，页 31-32。

会，他也以尖锐的辩才获得了“小钢炮”的外号，并连续七次当选省议员。李源栈（1910~69）在是当选高雄市议会议员后正式踏入政界，也连续当选了三届省议员，在议场以激烈的动作与不妥协的言论而知名。许世贤（1908~83）担任过嘉义市参议员，当选第二届临时省议会议员后，因为批判国民党而与其决裂，成为了首位女性的党外议员而声名大噪。

表：“五龙一凤”的议员在任时期（省参议会、临时省议会、省议会+立法院）

(就职年)	参 (1946)	临一 (1951)	临二 (1954)	临三/ 第一 (1957)	第二 (1960)	第三 (1963)	第四 (1968)	第五 (1972)	第六 (1977)	第七 (1981)
國·非國	24·6	43·12	48·9	53·13	58·15	61·13	60·11	58·15	56·21	59·18
李万居										
郭国基								69 立补		
郭雨新										
吴三连										
李源栈										
许世贤								72 立增	75 立增	
其他的主要党外议员	谢汉儒				余陳月 瑛 李秋遠	余陳月 瑛 李秋遠	余陳月 瑛 李秋遠	余陈月 瑛 许信良	余陈月 瑛 苏洪月 娇 黄玉娇 林义雄 张俊宏	余玲雅 苏洪月 娇 黄玉娇 游锡堃 苏贞昌

（略語）參：省參議會、臨：臨時省議會、立補：立法委員補充選舉、立增：立法委員增額選舉、國·非國：國民黨議員席次·非國民黨議員席次

（注）属于青年党籍的议员有李万居、郭雨新、苏洪月娇、游锡堃，民社党籍的议员有谢汉儒、李秋远、黄玉娇；郭国基在省参议会时期属于国民党，之后为无党籍；许信良虽然是国民党，但之后因为与党中央对立而被开除党籍。

透过选举当选，背负着民意而挑战国民党的党外议员并不限于这六人，但这六人宣示了民主主义的理念与原则来向政府挑战，从这点来看，五龙一凤的存在感与其他党外议员完全不同⁷。这里想先明确界定“党外”这个名词，在五龙一凤的时代，党外这个名词广泛的被用来指国民党以外的政治人物，可是在整个中华民国政

⁷ 例如连续五届当选省议员的党外议员余陈月瑛（第2、3、4、5、6届）就表示，她虽然与其他党外议员进行合作，但并不参与有关国家体制与意识形态等相关议题，而是将精力放在地方建设与教育问题（台湾省咨议会编、余陈月瑛口述，前揭书，页24-25）。

治史的发展中，青年党与民社党虽然属于国民党政府的友党，但如同后述，大部分的台湾地方政治人物仅将青年党与民社党视为暂栖之地而入党，同时也保有身为反国民党的无党籍议员的意识，没有改变自己的行动。只是也存在着虽未获国民党提名但并非反国民党的无党籍议员，过去为了明确对此进行区分，也有所谓“真正的党外”的用语。而本文在没有特别说明之处，将所有的反国民党的非国民党政治人物都以“党外”称呼。另外到了70年代后期，由于“党禁”的关系，“党外”这个名词也广泛被认知为是采取组织性行动的反国民党势力，成为一个的固有名词。这个过程也就是在野的政治人物透过《台湾政论》等杂志集结，于77年地方选举时组成了“党外人士助选团”，提出了共同政见，并且召开了座谈会与记者会，开始朝实际的政党发展⁸，在国民党的压迫仍然逐渐成长，最后组成了“民主进步党”。但五龙一凤的时代，“党外”这个名词并没有存在那么具体且明确的概念。

那么五龙一凤时代的省议会之中，以他们为代表的党外能否拥有足够的存在感被归类为是反对派？如果拥有，那么他们代表了什么意义？本文将以政治自由与人权的保障为前提，并列出三个指标以定义反对派，同时分析当时的党外势力的角色与意义，三个指标分别是：①有无议会民主主义制度；②选举竞争是否在公平公正的状况下实施；③议会有无表达反对意见的在野党。从这三个指标，我们可以很明白的指出，当时的台湾省议会虽然没有完全符合这三项条件，但反过来看，其实台湾省议会一定程度的满足了这三项条件。当时虽然并未完全限制言论自由，但如果反政府的言论过度激烈，则会遭到严厉的镇压；“台湾大”的议会制度虽然满足了①，但如果从本来被宪法予以保障的地方自治的观点来看，其实制度上并不能算完备；②有关选举的部分虽然保持一定程度的竞争，但大致上国民党仍然透过作票等各种方式控制选举；就③而言，省议会虽然存在着表达反对意见的议员，但他们并不具备政党组织的条件。也就是从整个状况来看，虽然当时的党外还不能算是反对派，但仍然满足了部分的条件。实际上五龙一凤在省议会提出的要求，也就是希望能让反对势力可以完全符合上述条件。本文接着将从他们的言论对上述各点进行整理、讨论⁹。

首先是关于第一个前提，中华民国宪法架构是以统治全中国为前提，而“台湾大”的议会民主主义就是属于这个架构下的地方自治，根据薛化元的整理，五龙一凤在省议会提出有关地方自治的主张包括有：①地方自治法制化、②中央侵夺省级

⁸ 若林正文，前揭《台湾一分裂国家と民主化》，頁191-207。

⁹ 五龙一凤在议会的发言纪录不仅量庞大，且议题等方面也有所歧异。不过目前已经有部分研究依议员与议题将其进行整理、分析，其中因为收录于台湾省咨议会编，《深化台湾民主、促进地方建设》（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年）一书中，薛化元的〈台湾省（临时）省议会时报对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张—以五龙一凤为中心的讨论〉与苏端锵的〈台湾省（临时）省议会“五龙一凤”对结社权的态度—以“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为中心〉的两篇论文针对议会民主主义的制度与运用方面的分析与本文关注的问题有所关连，因此相关讨论将依据两者的研究进行整理。

的权限、③省对县市自治权限的侵夺、④党化的问题、⑤省议员质询权限箝制等五点¹⁰。李万居在第一届临时省议会召开时就提出质疑，认为省议员依据宪法必须透过直接选举产生，要求必须成立正式的省议会。郭雨新也曾经提案要求成立正式的省议会，并追问省主席是否有这样的觉悟。郭雨新还提案，建议立法院应该要依据宪法制定原本就应该要立法的“省县自治通则”，这项请愿决议也获得省议会通过。许世贤质疑了省主席的权限范围，并批判省政府仿佛是中央政府的办事处。吴三连则对行政院擅自修改省议会的决议，且事后未请省议会重新进行审查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郭国基批判中央干涉省营企业，甚至强调如果中央政府这样做的话，干脆将省营企业的名称直接改为中央，或者干脆解散省议会¹¹。五龙一凤还批判省掌握了县市应有的权限是侵犯县的自治权；认为议会修改议事规缩短议员质询的时间，是限制民意代表替人民辩护的时间，对此予以抗议。另外也不断的质疑有关强迫教师加入国民党是将公家机关国民党化的行为、省政府挪用预算支持国民党活动的合法性等问题。

第二，五龙一凤经常提案与质询有关选举不公的问题。省议员从 1954 年的临时省议会起改为直接选举产生，但国民党透过强迫入党等方式对候选人施压，党外议员都是在受到来自国民党的压力的不利状况下当选，理所当然会对此类问题特别敏感。五龙一凤分别透过各种角度批评包括选举法规的问题点、买票的情况不断蔓延、发生于投开票时的不公等具体的选举不法行为。

第三，结社自由可以说是组成反对党的核心价值观，李万居对此在临时省议会质询，认为这些自由必须获得保障，郭雨新与吴三连也作出同样意见的发言¹²。当国民党开始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导致地方的政治菁英的自由空间越来越被限缩时，正好 1957 年地方选举的不公行为更加深刻，包括五龙一凤在内的党外人士准备利用这个机会组成“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但是两次申请都因为“动员戡乱时期人民团体法”等理由而未被受理。李万居与许世贤在质询时对于未被受理的理由提出疑问，并质疑在同样条件下其他团体却获得受理的公平性问题¹³。在这个成立组织的动向后，五龙一凤虽然开始推动不固定时间与场地的“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但是他们在省议会内并没有正面要求组成政党，可以说其提出的要求只针对组党的前一个阶段为止的程度。

如果是直接要求组成反对党的动向，那么雷震等人透过《自由中国》（1949 年 11 月～60 年 9 月）所展开的讨论则较为明确，雷震等人就是基于中华民国宪法以

¹⁰ 薛化元，〈台湾省（临时）省议会时报对地方自治改革的主张—以五龙一凤为中心的讨论〉，台湾省咨议会编，《深化台湾民主、促进地方建设》（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 年）。

¹¹ 薛化元，前揭文，页 40-44。

¹² 苏端锵，〈台湾省（临时）省议会“五龙一凤”对结社权的态度—以“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为中心〉，台湾省咨议会编，《深化台湾民主、促进地方建设》（台中：台湾省咨议会，2004 年），页 52。

¹³ 苏端锵，前揭文，页 53-57。

实现自由与民主的立场，不断主张议会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必须要有在野党存在。《自由中国》对于反对党的讨论，是在 50 年代末雷震等人开始全面启动成立新政党的活动时逐渐升温。除了五龙一凤，包括青年党、民社党、无党派的本省人政治人物也参与了组成新政党的准备过程¹⁴，但国民党政府因为外省人自由主义者与本省人党外势力的结合而感受到危机，组党也因为雷震遭到逮捕而受挫。纵使如此，在基层社会拥有支持基础的本省人党外政治人物们仍然有他们必须要回归的战场，也就是“选举与议场”。

从以上的观察可以得知，五龙一凤在省议会提出的言论并非是正面突破组成政党这个最后的关卡，而是谋求希望能在台湾这个区域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主义。几位对于民主主义的原理拥有共同理解、又有辩才的省议员，利用在正统性上毫无疑问的中华民国宪法为盾牌，对以动员戡乱为理由进行党的改造、集中权力以建构一党独大体制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批判，要求消除所谓“地方自治的赤字”。

但五龙一凤并非采取过激的主张与行动来宣扬自己的理念，相较于日后的党外立法委员，五龙一凤在议场采取了非常稳健的态度，而非过激的动作。根据前省议员回忆，五龙一凤不仅在审议时不会采取将对手逼到绝境的态度，与其他议员同事来往时的态度也不分党派¹⁵。特别是李万居与郭雨新获得了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的省议员的尊敬。李万居在省议会展现了大前辈的风范，省议员不分党派都非常尊敬他¹⁶。郭雨新与议员来往时不分党派，而且态度亲切。特别是郭雨新会替对方着想，在遭国民党当局严厉监视的时期，他曾经拒绝了想与他深入来往的国民党议员，原因是接近他可能会遭到当局无谓的怀疑，前途可能会因此受到影响¹⁷。吴三连、许世贤也因为谈吐与态度高雅、高尚而为人所知¹⁸。另一方面，郭国基与李源栈因为个性豪放而知名，但他们的发言与行动也没有到破坏议场秩序的程度。郭国基经常在自己的质询结束后就立刻退席，有议员曾经问他退席理由，郭国基回答：“我是来讲道理的，不是来听话的”¹⁹。多数国民党籍的前省议员认为党外议员对于台湾的民主主义有很大的贡献，也有不少人认同他们的主张，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前省议员现在是站在评价过去历史的立场，才会做出这样的发言。

党外议员虽然是属于议会的少数派，但他们也有占优势之处。相较于必须遵守省党部与党团指示的国民党议员，党外议员因为不受到这种约束而可以自由进行

¹⁴ 苏端锵，《战后台组党运动的滥觞——“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台北：稻乡、国立编译馆，2005年）。

¹⁵ 台湾省咨议会编、李雅樵口述，前揭书，页 50；台湾省咨议会编、林明德口述，前揭书，页 46、57；台湾省咨议会编、黄光平口述，前揭书，页 11；台湾省咨议会编、王国秀口述，前揭书，页 41。

¹⁶ 台湾省咨议会编、林明德口述，前揭书，页 64。

¹⁷ 台湾省咨议会编、黄金凤口述，前揭书，页 61。

¹⁸ 台湾省咨议会编、李秋远口述，前揭书，页 31。

¹⁹ 台湾省咨议会编、王国秀口述，前揭书，页 40-41。

发言，且可以作出国民党籍议员想却无法作的质询内容²⁰，国民党籍议员有时也会认同他们的发言。也有人回忆，省政府其实很尊重党外议员的自由，以省主席为例，省主席必须在省议会议场直接接受省议员的质询，从周至柔、黄杰、陈大庆等外省籍军人（1957~72），到谢东闵、林洋港、李登辉等本省籍的文人担任省主席的时代（72~），纵使军人出身的省主席会高压的制止国民党籍议员发言，他们对于党外议员的发言则是表现出谦虚的态度，纵使是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发言，也会安静的聆听²¹。而最让必须接受质询的政府官员苦恼的，莫过于如何回答党外议员的质询。

也有人认为，党外议员可以在议场自由发言的原因，是当局认为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有限。李万居的《公论报》（1947年10月~1961年3月）虽然对党外议员的发言持续进行报导，但其他的报社几乎都没有报导省议会的审议过程。李秋远曾经表示：“他们不过是在议场跟国民党争论而已”²²。由于也有人对《公论报》的影响力提出了正面的评价，所以有必要进行更细部的检讨，但可以确定的是，相较于70年代后半，这个时期的党外媒体拥有的影响力应该非常有限。

从以上的检讨可以发现，五龙一凤充分理解议会民主主义制度、反对派存在的理由合理念，但他们是在被限制的体制内要求政府，希望尽可能使现状能够接近理想。他们实践理想的战场就是“选举与议场”，不使用体制外的手段，媒体的运用也遭到限制。基本上是采取个人行动，虽然也会进行合作以掌握审议的主导权，但组织性的行动非常的薄弱。确实他们参与了雷震等人的组党运动，但他们应该是因为有机会组党所以才会参与，当雷震失败后，他们又选择回归原本的战场，也就是“选举与议场”。虽然没有办法组成反对党，但他们采取了属于议会民主主义反对党议员的态度与作为。

四、 党外与党外政治：从政党体系的观点所做的分析

那么我们要如何从政党政治的观点，来解释无法拥有在野党的省议会却存在着党外势力的现象？或者是我们能否将之解释为省议会存在着政党体系？

首先从青年党与民社党两个国民党当局正式承认的政党来讨论。省参议会的议员席次实际上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事先进行分配而产生（30席之中，国民党24、青年党3、民社党3），这样的席次分配属于国民党为中心的霸权政党体系²³。不过进入到临时省议会时期，议员则是透过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选举方式

²⁰ 台湾省咨议会编、陈庆春口述，前揭书，页40。

²¹ 台湾省咨议会编、陈庆春口述，前揭书，页39-40；台湾省咨议会编、余陈月瑛口述，前揭书，页27。

²² 台湾省咨议会编、李秋远口述，前揭书，页31。

²³ G·サルトーリ（Giovanni Sartori），《现代政党学（新装版）》（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2年），页381-394。

的改变使得省议会的霸权政党体系逐渐崩解。而且议员透过直接选举从台湾各地产生，使得议员结构从半山人士为中心逐渐转型为以本省人中心，导致没有深入台湾社会的青年党与民社党陷入了困境。

青年党（正式名称为中国青年党）与民社党（正式名称为中国民主社会党）因为在大陆参加了《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并依附于国民党政府，因此国民党政府迁台后承认其为“友党”，在国政层级也给予一定的职务。可是青年党与民社党在台湾社会基层缺乏存在感，原因是这两个政党的主要干部无论在思想或行动都以统一中国为前提，主要是在美国与香港等海外地区活动。相较于国民党透过地方有力人士深入台湾社会，青年党与民社党只能在少数地区建立据点。如果从省议员的席次来看，青年党拥有李万居、郭雨新、苏洪月娇、游锡堃，民社党拥有谢汉儒、李秋远、黄玉娇等重要议员，两党看起来似乎仍保有一定的势力，但笔者接着将分析实际的情况。

青年党于 1923 年在巴黎成立，26 年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29 年公布党名，主要领导人有曾琦、李璜、左舜生等人，虽然长期批判国民党的一党独大体制，但也派出代表参加了 1947 年的制宪国民大会，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定，并且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职务。青年党于 1949 年随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不仅国会议员席次获得保障，也仍在政府获得重要职务，因此在“爱国、民主、反共”的旗帜下与国民党政府合作，以推动反攻大陆这个大目标，但也仍维持实现监督政府、实现民主宪政的立场²⁴。可是实际上由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已经稳固，国民党政府也每个月以“反共抗俄宣传费”名义对青年党提供财政支持，青年党也藉此维持着组织的运作，成为了国民党一党独大体制的一部分存在。

青年党虽然也以获得台湾的政治菁英支持为目标，但党的最高领导人们以香港与美国为活动据点，加上党组织因为“天马茶房事件”后不断发生严重的分裂与内斗，因此深入台湾社会的工作只能依靠李万居与郭雨新等在台湾土生土长的领导人的个人努力。可是除了在大陆时期因为对党的思想有所共鸣而在法国留学时入党的李万居，本省籍政治人物入党的动机多是受到其尊敬的领导人的影响、在野势力希望在进行政治活动拥有一个护身符等等。1948 年入党的郭雨新虽然曾经在党的刊物表示是对党的主义与目的有所共鸣而入党²⁵，但是郭雨新身边的人士所作出的证言与郭雨新的文字有所不同。虽然无法确切掌握其入党的动机，不过有人表示，郭雨新是因为光复后亲眼见到国民党官员强权且粗暴的作为，以及遭遇二二八事件，身为一个立场非国民党的政治人物，为了从事政治活动时不受到国民党的迫害而加入了青年党²⁶；也有一说是李万居建议原本是无党籍的郭雨新加入青年党，

²⁴ 王觉源，《中国党派史》（台北市：正中书局，1983 年），页 378-380、475-476。

²⁵ 郭雨新，〈中国青年党与我〉，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组，《中国青年党建党卅九周年纪念专刊》（台北市：中国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组，1962 年），页 51。

²⁶ 张文隆，〈郭雨新（1908-1985）与战后台湾党外民主运动〉（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

以避免遭到国民党的迫害²⁷。当时担任郭雨新的秘书的陈菊也曾表示，郭雨新入党后，对党的现实状况幻灭，多次对陈菊说：“那个青年党没有用啦！”²⁸。另外如苏洪月娇的先生，也是云林县的青年党干部苏东启，当初是国民党员，但因为省参议员时代想投票给其尊敬的李万居却被禁止，因而转至青年党。苏洪月娇本人则是因为先生受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成为了先生在政治上的继承人而加入青年党，也当选议员²⁹。青年党可以说是连被认为是党的象征的政治人物都只将其当成一个暂栖之地的政党。

也是宜兰县名士的郭雨新所作出的贡献更是需要特别说明。由于郭雨新支持层的人脉关系，据说青年党在宜兰有 300 到 400 名党员³⁰，在宜兰土生土长的游锡堃就是因为对郭雨新的憧憬而加入青年党³¹。不过游锡堃后来虽然成为党的干部，但因为宜兰县党部的预算太少而没有固定的办公室³²。游锡堃本人也回忆，他是透过青年党领导人的著作，学习到所谓民主主义就是政党政治、民意政治、议会政治³³。从游锡堃的谈话可以发现，青年党在政治启蒙活动方面其实也达到了一定的成果。不过郭雨新采取公开、广泛招募党员的方式，而青年党中央的态度却是保密且慎重，双方因此持续发生对立³⁴，这里也可以看出青年党的党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隔阂。

至于民社党，则又比青年党更像是本省籍政治人物的暂栖之地，民社党是由张君勱所组成的中国国家社会党、活动据点设海外的民主宪政党于 1946 年合并成立，于 1947 年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不过党纲的内容却接近三民主义³⁵，也派遣代表参加同年举行的制宪国民大会，与国民政府合作。民社党在 1949 年与国民党一起迁台，但党主席张君勱前往海外，因此由徐傅霖担任代理主席。不过民社党也因为与国民党的关系、“反共抗俄宣传费”等问题而陷入长期内斗，处于四分五列的状态³⁶。

研究所硕士论文，1994 年），页 168-169。

²⁷ 张文隆、陈仪深、许文堂访问，《郭雨新先生行谊访谈录》（台北：国史馆，2008 年），页 151。

²⁸ 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美丽岛事件口述历史编小组编，《没有党名的党—美丽岛政团的发展》（台北：时报，1999 年），页 30。

²⁹ 陈仪深访问、苏洪月娇口述，〈苏洪月娇女士访问纪录〉，《口述历史》10 期（2000 年 12 月），页 21-35。

³⁰ 张文隆、陈仪深、许文堂访问，前揭书，页 185-186。

³¹ 台湾省咨议会编、游锡堃口述，前揭书，页 10-12。

³² 张文隆、陈仪深、许文堂访问，前揭书，页 297-298。

³³ 台湾省咨议会编、游锡堃口述，前揭书，页 22-23。

³⁴ 陈正茂，《台湾早期政党史略（1900-1960）》（台北：秀威信息科技，2009 年），页 202-211。

³⁵ 王觉源，前揭书，页 373-375、474-475。

³⁶ 陈正茂，〈沧桑五十年—记民社党在台湾〉，《传记文学》第 91 卷第 6 期（2007 年 12

虽然有后来成为省参会议员的谢汉儒等人努力在台湾建立党组织，但与青年党相比，民社党更没有培养出拥有身为党员的自觉的本省籍领导人。民社党采取的战术是提名有实力的本省籍候选人参加选举，首先是 1950 年当选花莲县长的杨仲鲸，接着有 54 年当选台北市市长的高玉树、60 年与 64 年当选基隆市市长的林番王、68 年当选高雄市市长的杨金虎，催生了许多党外的地方首长。但这些本来是无党籍的政治人物即使获得民社党的提名，被认为“当选后就忘记民社党”、“所有参加民社党的本省人中唯一没有动摇，自始至终承认自己是民社党的，就是杨金虎”³⁷。对党外的地方首长来说，虽然“民社党立即表示愿全力支持...却没有一个人提到要如何支持、如何赢得选票的事”，“我不再对该党寄以任何希望而独自奋斗了”³⁸。省议员也是一样的状况，民社党提名当选的许世贤与李秋远在议会都不被认为是代表民社党，他们在议会的发言纪录与回忆录等文字纪录也很少提到民社党³⁹。所以在台湾地方政治上，民社党与青年党相比，是一个存在感非常小的政党⁴⁰。

从这些状况可以看出，青年党与民社党虽然在“选举”的场合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但两党的议员在“议场”与反国民党的无党籍议员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完全不算是政党。所以省议会的政党政治的状况，可以说是由省党部与党团所指导、监督的多数党国民党议员，与不属于共同组织但立场是批判国民党的少数派党外议员的两派对峙。这应该可以说是拥有政党体系的特征。

如果试着从萨托利的政党系统来分类，只要议会存在透过选举而产生的反对势力，就不能算是执政党完全掌控的“一党体系”。议会民主政治是正统的政治原理，如果这个信念已经深入政治社会，即使出现了权力集中于一个政党的状况，该政党也会因为无法获得正统性而难以实现单纯的一党体系。但因为不存在足以称为在野势力的政党，也不完全符合所谓压倒性的执政党与弱小的“次级政党”竞争的“霸权政党体系”。台湾省议会的状况可以说比较接近萨托利所谓的“霸权政党体系的前一步”，也就是在野势力虽然可以参加选举，但不被容许成立正式的政党组织（连次级的政党的存在都不被容许）。如果将之称为“准霸权政党体系”⁴¹，议员透过直接选举产生的临时省议会开始的政党间的势力关系，就是属于准霸权政党体系，也就是国民党与“无法拥有组织的党外议员的集合体”的关系。五龙一凤

月)，页 37-42。

³⁷ 台湾省咨议会编、谢汉儒口述，前揭书，页 36。

³⁸ 高玉树口述、吴君莹纪录、林忠胜撰述，《高玉树回忆录—玉树临风步步高》（台北：前卫，2007 年），页 54。

³⁹ 李秋远在接受台湾省咨议会的访谈时，完全没有提到民社党的事情；访谈的附录之中的质询记录里，也只剩一小段提到“我是民社党，或是党外人士也好，我很乐意……以在野的立场帮忙国民党……”（台湾省咨议会编、李秋远口述，前揭书，页 119）。

⁴⁰ 台湾省咨议会编、林明德口述，前揭书，页 57。

⁴¹ 岸川毅，〈政党型権威主義体制と民主化〉，砂田一郎・白鳥令編，《現代政党の理論》（東海大学出版会，1996 年）。松本充豊，〈台湾の政党システム〉，岩崎正洋編，《政党システムの理論と実際》（おうふう，2011 年）。

基本上就是在这样的政党体系之中以个人的方式进行政治活动。

五、 结论：“五龙一凤”留下了什么“遗产”？

那么五龙一凤等省议会的党外人士们达到的成果，对之后的台湾议会政治造成了什么影响？我们能否由此找出其与之后的世代之间的延续性？最后将对此进行分析，以此作为本文的结论。

第四届省议会召开时，五龙一凤只剩下郭雨新与郭国基仍担任省议员。郭雨新当时遭到当局不断强化监视与压迫，正迎向议员生涯的最后阶段（郭雨新放弃参选第五届省议员，虽然参选了 1975 年的增额立委选举，但因为疑似选举不公而落选，最后前往美国）；郭国基则是健康状况不佳（虽然在 1969 年的立法委员增补选当选，但 70 年就过世）。另一方面，许世贤在 1972 与 76 年的增额立委选举当选立委，将活动舞台转移到立法院，此时也正是立法院的结构逐渐朝“台湾大”转换的时期。

而五龙一凤的时代结束后，取而代之的新世代分别有第五届省议会的许信良（原本为国民党籍，但因为和党对立而被开除党籍），第六届的林义雄、张俊宏、苏洪月娇、黄玉娇，第七届的游锡堃、苏贞昌。特别是第六届有许多党外议员当选，这些党外议员采取了密切的合作，不仅经常一起用餐，进而转化为密集连络的集团⁴²。正如大家所知，这些省议员推动了党外人士采取组织性的活动，这最后也成为了日后民进党组党的基础。这个世代的省议员之中，有许多人在立法院开始定期改选后，将活动舞台转移至立法院。

随着世代交替，党外议员的行动模式与战术也开始有了变化。虽然基本态度仍然是遵守议场运作的秩序，但也出现了采取态度尖锐且不妥协的议员。如许信良（第五届）在发表了描写省议会实际情况的著作《风雨之声》，导致了许多议员同事的反感。苏洪月娇（第六、七、八届）与黄玉娇（第六、七、八届）虽然并称为“南北双娇”，但后来黄玉娇因为采取过激的言论与动作而受到注目，正好这也是议员开始积极利用媒体的时期，有议员同事问黄玉娇为何要采取过激的言行时，黄玉娇回应是为了被报纸报导⁴³。印刷媒体是当时的主流媒体，除了《台湾政论》等党外杂志开始发行，许信良以外的党外议员也发表了政治活动的相关内容与其著作，如林义雄与姚嘉文的《虎落平阳》（1977）、林义雄的《从兰阳到雾峰：瞧这个省议会》（1978）。另外如采访省议会的记者陈婉真发表了《垂帘听政治》（1977），郑牧心发表了《台湾省议会之变局》（1980）等。

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如邱连辉（第五、六届，但第六届转为党外）、蓝荣祥（第

⁴² 台湾省咨议会编、余陈月瑛口述，前揭书，页 23。

⁴³ 台湾省咨议会编、余陈月瑛口述，前揭书，页 19。

五、六、七届)、林侑廷(第五、六、七、八届)等被称为“头痛”议员的国民党籍议员。林侑廷、刘邦友(第六、七、八届)、郑逢时(第七、八届)、童福来(第七、八届)甚至被称为“四顽童”。这些国民党籍的省议员有时也会基于大是大非的原则支持党外议员⁴⁴，这样的现象应该是因为省议会的气氛开始改变所造成的。

那么五龙一凤对下一世代的党外议员有什么影响？从一般论来看，李万居与郭雨新属于基于民主的价值观、在议会进行正统派式论战的模范先驱，留给了后世深刻的印象。但能够确认五龙一凤所造成的明确影响，应该是属于个人层次的部分。正如大家所知，郭雨新不仅在自己的故乡宜兰培养了许多后继者(游锡堃、林义雄、陈菊等)，也将自己在台北的家称为罗马宾馆，提供党外人士进行交流，协助党外建立日后成为其活动基础的人脉关系。另外一个案例是郭国基，黄信介就是因为旁听了省参议会时开始对李万居与郭国基有所敬意，特别是日后与郭国基频繁的接触而将其视为老师，据说黄信介在 1969 年立委增补选当选时，郭国基还对他说：除了你以外没有第二个人，只有你才有办法接我的棒子⁴⁵。

以上只能针对五龙一凤给予下一代党外人士的影响及其延续性进行的片段的分析，仍然需要更有系统的进行检讨。

⁴⁴ 台湾省咨议会编、蓝荣祥口述，前揭书，页 50-54。

⁴⁵ 新台湾研究文教基金会美丽岛事件口述历史编小组编，前揭书，页 5-6。

附记

本论文是岸川毅〈台湾省議会とオポジションの形成——党外議員の行動と戦略——〉《日本台湾学会报》第 18 号（2016 年 9 月）的中译稿，在此向允许转载的日本台湾学会报编辑委员会表示感谢，也要向两位匿名审查者、翻译本文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黄伟修表示谢意，另外编辑部在徵得本人同意后，调整了本论文注释格式，这些修正并没有影响到论文内容与作者的观点。本论文也是日本独立行政法人学术振兴会提供的科学研究费基盘研究 B「台湾政治における反対党の誕生：国際体制・孤立国家・市民社会とナショナリズム」（研究代表：若林正丈，课题号码：24330046）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岸川 毅 Takeshi KISHIKAWA

学 历 上智大学外国语学研究所国际关系论专攻博士班满期退学

现 职 上智大学全球学部教授

研究领域 比较政治学、拉丁美洲政治、台湾政治

电子邮件 t-kishik@sophia.ac.jp

译者简介

黄 伟修 Wei-Hsiu Huang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

官方网页 <https://weihsiuhuang.jimdo.com/>

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 2017年8月1日创刊

出版日：2018年7月1日

出版者：当代日本与东亚研究会

编辑部：

主编：松田康博

副主编：清水 丽

副主编兼执行编辑：黄 伟修

助理编辑：魏 逸莹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Date of Publication: July 1, 2018

Publisher: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Editorial Office:

Editor in Chief: Yasuhiro MATSUDA,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Urara SHIMIZU, Ph.D

Vice Editor in Chief and Executive Editor: Wei-Hsiu Huang, Ph.D

Assistant Editor: Iying WEI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

July 1, 2018 Vol. 2 No.7

<http://jeast.ioc.u-tokyo.ac.jp/>

The Rise of the Opposition in Taiwan's Provincial Assembly: Behavior and Strategy of *Dangwai* Assemblymen

Edited and Published by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Japan and East-Asian Studies